

中外经典作家

# 论中国人



刘文荣 选编

中外经典作家

# 论中国人

◎ 刘文荣 选编

文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经典作家论中国人 / 刘文荣选编.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496-1219-2

I. ① 中… II. ① 刘… III. ① 民族性—中国—文集  
IV. ① C95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2412 号

---

## 中外经典作家论中国人

选 编 / 刘文荣

责任编辑 / 陈今夫

封面装帧 / 陆震伟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960 1/16

字 数 / 435 千字

印 张 / 26

ISBN 978-7-5496-1219-2

定 价 / 48.00 元

## ■ 前 言

本书题名为“中外经典作家论中国人”，意思就是：这里收集的文章均出自经典作家之手，而且绝大部分是公认的、经常被人引用的经典之论。

为什么要编这么一本书呢？因为不曾有人编过。关于中国人的书固然很多，但没有一本像本书这样全面、这样“经典”，把古今中外经典作家论中国人的经典之论囊括在内。

当然，“全面”是相对而言的，因为书总有篇幅之限。经过筛选，本书收入了27位中外经典作家的42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并分为两个部分——“外国篇”和“中国篇”。

把“外国篇”放在“中国篇”之前，是因为最早谈论中国人的是外国人，或者说，是因为中国的古人从未把中国人当作一个整体来谈论过，而外国的古人，早在17世纪就开始谈论中国人了。

那么，外国人是怎样谈论中国人的？从本书“外国篇”所收篇目中就可看出一个大概。

这部分共有16位外国经典作家的18篇文章，按年代排列，以示历史轨迹——最早的发表于1613年，最晚的发表于1920年，时间跨度300多年。这些作家的国籍分别是意大利、德国、法国、美国、英国、俄国和日本。

乍看之下，这些作家的文章一定是五花八门的，因为时间相隔那么长，国家又那么多。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他们都是经典作家，谈论的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很容易理出一个头绪。

大概是这样的：300多年来，各国对中国人的看法没有国别差异（即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人有特别的看法），只有时代和个人差异（即不同时代和不同个人

对中国人有不同看法)。当然,在不同的时代,还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

说得具体一点,18世纪之前的欧洲人对中国了解甚少,至16世纪时,因为有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才有一些零星的关于中国人的讯息传回欧洲。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教,最关心的当然就是中国人的习俗和信仰,而且毫无疑问,中国人的习俗和信仰在他们看来是大有问题的——否则,他们又何必来传教?而这些传教士对中国人的看法,就代表了当时欧洲人的“中国观”。这方面,本书所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人的习俗与信仰》一文,就是最具权威性的文本之一。

到了17世纪下半叶,随着传教士和商人传回欧洲的讯息越来越多,欧洲知识界开始注意到中国的道德学说,主要是儒家学说。由于儒家道德显然不同于基督教道德,欧洲知识界还由此产生了争议。凡坚持基督教道德的学者,都和传教士一样,对中国人的道德基本上是否定的。但也有一些怀疑基督教道德的学者,则肯定中国人的道德,认为这种道德以理性为基础,因而更合乎自然。在这方面,当时的德国哲学家、大学者莱布尼茨则是取折中观点,即认为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固然很重要,但首先要传播欧洲的哲学和科学;否则,基督教很难在中国传播——这一点,可从他的《〈中国近事〉序言》的一文中看出。然而,他的学生、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却把他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即认为:人类道德应以理性为基础,不能基于天启(即信仰),所以——尽管他没有直说,但意思很明确——儒家的道德比基督教道德更合乎自然。沃尔夫可说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儒家拥护者”的代表,而他的观点就集中表现在本书所选的《关于中国人的道德学》一文中。

总的说来,17世纪的欧洲人还只是偶然提起中国人。但到了18世纪,情况就有所不同了。18世纪是欧洲的“启蒙时代”(也称“理性主义时代”),由于这一时代是欧洲翻天覆地的时代,同时对中国人的了解也已有所深入,所以思想家们在辩论时经常会牵涉中国人,以此来旁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譬如,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是“共和派”的思想先驱,他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严厉批评中国的专制主义;而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则是“保皇派”的代表,他在《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中明确反对孟德斯鸠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是一种有利于民生的专制主义,孟德斯鸠有意夸大了它的残暴性。同样在18世纪,法国哲学

家伏尔泰是有名的“中国赞美者”，因为他主张“自然神论”，严厉批判基督教会，为此还坐过牢，中国的世俗道德自然就成了他的赞美对象；而德国哲学家、“狂飙运动”思想领袖赫尔德尔，则是同样有名的“中国厌恶者”，因为“狂飙运动”是德国的思想解放运动，赫尔德尔为自由而呐喊，中国的专制、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了他的厌恶对象。可见，在他们那里，“中国问题”是服从于“欧洲问题”的。

这样，随着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随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声在欧洲回荡，乃至向全世界传送，孟德斯鸠和赫尔德尔的“中国观”便成了欧洲的主流观点。

其后，在19世纪，这一主流观点又由众多欧洲学者予以反复论证。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因为当时对“汉学”研究最感兴趣的是德国人）；譬如，代表德国古典哲学的四位哲学家中，有三位——即康德、谢林和黑格尔——谈论过中国人的习俗、宗教和民族性：康德晚年口述过一篇关于中国人的文章；谢林则在《神话与天启哲学》一书中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中国人的宗教；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中也有“中国”一章，论述中国人的民族性——这些，都是后人经常引用的经典之论。

此外，还有一个美国人，即阿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更为这一主流观点提供了许多具体的证据。阿瑟·史密斯是在中国传教多年的传教士，他在19世纪末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人的性格》的书，列举了中国人的许多性格特点。这本书在20世纪影响很大，许多研究中国文化的欧美学者都曾提到过或引用过，甚至有不少中国现代学者和作家也提到过或引用过，特别是鲁迅，几次向国人推荐此书。

那么，关于中国人，19世纪欧美的主流观点是什么呢？简单地就说就是：中国和中国人是专制、愚昧、落后的代表，是民主、科学、进步的对立面。

然而，正是这一主流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仅被有头脑、有勇气的中国人接受，还由此在国内引发了关于国民性的讨论——关于这些中国人，后面马上就会讲到。现在要说的是，20世纪初的外国人是怎样看待中国人的？

在当时，19世纪的主流观点依然是主流观点，但和以往一样，也出现了一些非主流的、甚至反主流的观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三个人：一个是俄国大作家

托尔斯泰，还有两个是英国著名小说家 H. G. 威尔斯和英国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特兰·罗素。托尔斯泰没有写过关于中国人的文章，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是从他写给两个中国人的两封信中表达出来的，即认为：中国人并非愚昧、落后，恰恰相反，是具有真正的基督精神；所以，中国人不应该模仿西方人，倒是西方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显然，托尔斯泰的观点是反主流的，同时也是以他的“勿以暴力抗恶”原则为基础的：因为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除了忍受，没有做任何事情，所以他认为，这是“勿以暴力抗恶”的最好范例，是中国人拥有一种精神力量的证明。H. G. 威尔斯的观点并不反主流，但属非主流——他在《世界史纲》一书里认为，中国人曾有辉煌的文明，只是到了近代，才被西方人超越，其原因不是中国人愚昧，甚至都不是中国的专制制度，而是由于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太古怪——语言太简、文字太繁<sup>①</sup>，所以中国人缺乏精确思维，表达又很困难，这才导致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停止不前。至于伯特兰·罗素——他在 20 世纪最初二三十年间曾几次到中国讲学——虽然他也承认中国人有某些缺点，但他认为中国人总体上和英国人、美国人一样，属于优秀民族。这可能和他特别憎恶日本人有关，因为日本人屡屡对中国人发动战争，并占领中国大片的土地。

说到日本人，本书也选入了两位日本近代著名学者的两篇论中国人的文章：一篇是桑原鹭藏的《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一篇是渡边秀方的《论中国人的矛盾性》。需要说明的是，日本的古人和中国的古人一样，也从未把中国人当作一个整体来谈论过；近代日本人谈论中国人的民族性，则是受了欧美人的影响，或者说，是步欧美人的后尘。不过，由于日本人在文化上和中国人有亲缘关系，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毕竟和欧美人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这两篇文章仍有独到之处，值得一读。

现在，应该说到中国人论中国人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国篇”里，共有 11 位中国著名作家的 24 篇文章，也是按年代排列的，最早的发表于 1895 年，最晚的发表于 1984 年，时间跨度约 90 年。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历史学家所称的“晚清大变局”。导致“大变局”的表面原因，是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以及军事失败后的割地赔款，但其根本

---

<sup>①</sup> 指文言和繁体字。

原因,则如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所说,是“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即国民素质有问题——“民弊而国弱”,所以严复认为,强国之道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这样,严复开了中国人论中国人的先河。

继而是梁启超,这位“戊戌变法”的直接参与者,在“变法”失败后致力于国民性研究,遂成近代大学者。梁启超论中国人的文章很多,本书所选两篇,均写于1903年。一篇是《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篇是《新大陆游记》的节选,题名为《中国人之缺点》。比严复进一步,梁启超较为具体地指出了中国人的品格特点,如:“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等等,并由此论定,中国人为三等国民,其国家必为“受人轻侮之国”。

不过,在当时对中国人的品格、传统道德,尤其是对儒学的一片责难声中,仍有人不以为然,公开为旧传统、旧道德辩护。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辜鸿铭。实际上,辜鸿铭受到的外国教育比当时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多,身上还有一半英国血统。但这个“半洋人”偏偏逆潮流而行,在他的一系列英语演讲中称颂中国传统文化,称颂传统中国人。譬如,在他的一次题为《中国人的精神》的演讲中,他说传统中国人过的是一种“心灵的生活”、“情感的生活”,也就是真正的生活,而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中国人一直恪守传统道德,恪守儒家的“君子之道”、“三纲五常”。他还说,这种生活其实也是西方人所向往的,只是他们做不到,于是便攻击中国文化,攻击中国人。

辜鸿铭和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有相似之处,才华过人,却不合潮流。他的观点固然不乏赞同者,但在当时声浪日高的新文化运动中,只能说是非主流。而主流观点,我们知道,是由胡适和鲁迅等人代表的,尽管主流观点之间也有分歧。

实际上,就“中国人”这一论题而言,胡适直接表述得并不多,只是在早期写过一些揭露中国人劣性的短文,以及在20年代发表过两篇嘲讽中国人的文章,即《差不多先生传》和《打倒名教》。这两篇文章虽是关于中国人性格的经典之论,但也只有这两篇。胡适本质上是个学者,不是作家,他的大量著作都是有关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

和胡适相反,鲁迅本质上不是学者,而是作家,所以他直接论到中国人性格的文章特别多,经典之论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整部《鲁迅全集》几乎都是对中国人的嘲讽。要在这么多文章中进行选择,并不容易。本书最终选定的几篇,即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论“他妈的！”》和《略论中国人的脸》等，都属鲁迅的名篇，所嘲讽的是中国人的奴性。实际上，鲁迅最憎恶的就是中国人的奴性。在他看来，所谓改造国民性，就是要改掉这种奴性。

除了胡适和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讨论国民性的作家当然还有很多，但限于本书要选的是“经典作家”，所以出现在这里的仅为周作人、沈从文和林语堂。周作人的《〈男人和女人〉》虽是一篇书评，但其中摘录的内容不只是和当时的国情有关，还涉及中国人的国民性，至今似乎仍有现实意义。沈从文的《中国人的病》是他仅有的一篇直接评论中国人性格的散文，文中对中国人的自私、无道德作了分析，并对如何治疗这种“病”提出了他的看法。林语堂大概是关注国民性仅次于鲁迅的现代作家，但他不像鲁迅那样犀利——这从本书所选的几篇文章中即可看出：他早年论中国人还是相当严厉的（见《中国人的国民性》），但后来在他用英文写的几本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人的书里，他力图把中国人的性格全面呈现出来，所以，相对而言就比较温和了（见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

30年代中期，随着抗战的爆发，新文化运动不了了之，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也就沉寂了。不过，在1944年，张爱玲写了一篇名为《中国人的宗教》的文章，发表在《天地》月刊上，此文虽是为外国人写的，也算聊胜于无。还有就是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其中论到中国人的民族品性，而此书出版的时候，已是1949年了。

此后，便不再有人谈起国民性。直到80年代中期，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一书（1984年），并在国内引起不小的轰动（1986—1988年），国民性问题才重返人们的视野。

如今，2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还丑陋吗？还需要反省吗？如果回答是“是的”，那么，本书就是最好的教材。

刘文荣

2014年3月于上海

# ■ 目 录

## 前言 1

## 外国篇

[意大利] 利玛窦

中国人的习俗与信仰 3

[德] 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

《中国近事》序言 23

[德] 克里斯蒂安·沃尔夫

关于中国人的道德学 32

[法] 夏尔·德·孟德斯鸠

中国人的政治、法律与习俗 45

[法] 弗朗索瓦·魁奈

中国人的“天” 54

就中国的专制主义与孟德斯鸠商榷 59

[法] 伏尔泰

中国 64

[德] 约翰·冯·赫尔德尔

中国人的特性 69

[德] 伊曼努尔·康德

关于中国人 78

[德] 弗里德里希·冯·谢林

论中国人的国家崇拜 84

[德] 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中国人的民族性 97

[美] 明恩溥

中国人的性格 114

[俄] 列夫·托尔斯泰

中国人完成了一项伟大的英雄业绩 137

中国人不应当模仿西方民族 140

[英] H.G. 威尔斯

中国人的成就与束缚 144

[英] 伯特兰·罗素

中国人的性格 165

[日] 桑原鹭藏

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 175

[日] 渡边秀方

论中国人的矛盾性 191

..... 中 国 篇 .....  
.....

严复

论生民之大要 203

梁启超

论中国国民之品格 215

中国人之缺点 223

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 231

胡适

上海的中国人 260

中国人之大耻 263

“暴堪海”舰之沉没 266

差不多先生传 268

打倒名教 271

鲁迅

随感录(三十五至三十八) 279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286

灯下漫笔 290

论“他妈的!” 297

略论中国人的脸 301

中国的奇想 305

周作人

《男人和女人》 308

沈从文

中国人的病 313

林语堂

中国人的国民性 317

中国人之品性 323

中国人的吃与喝 346

张爱玲

中国人的宗教 354

梁漱溟

论中国人的民族品性 368

柏杨

中国人与酱缸 379

丑陋的中国人 387



# 外 国 篇





# 中国人的习俗与信仰

[意大利] 利玛窦



利玛窦(Matteo Ricci 的旧译名,今或译为“马蒂奥·利奇”,1552—1610),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他于1582年随传教团抵达中国,先在澳门、韶州、南昌和南京等地传教,后定居北京,直至1610年病故。主要著作有《天学实义》《畸人十篇》《辨学遗牍》以及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等。此外,他还用拉丁文写有一部记述他在华传教经历的手稿。此手稿在他死后由其教友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的旧译名,今或译为“尼可拉·特里高尔”,1577—1628)来华整理,并带回欧洲出版,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3,共两卷),后成为欧洲学者研究中欧早期关系的重要文献。此书部分章节曾在20世纪30年代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刊印过,完整的中译本最初出版于1983年,取名《利玛窦中国札记》。

此处辑录的是此书第一卷第九章和第十章的最新译文,题目系编者所加,章节标题为原书所有。

作为传教士,利玛窦最关心的当然是中国人的习俗与信仰问题。因而,他在此书中用了整整两章专门谈论这一问题。在他看来,中国人的习俗愚昧而迷信;譬如,做事出行都要看皇历,相信测字算命、相面、看风水,甚至还相信炼金术、炼丹术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习俗,有的荒唐可笑,如犯人——甚至犯错误的官员——要被按在地上打屁股;有的野蛮恐怖,如女人和婴儿可以随便买卖、人没钱养活自己可以卖身为奴;更可怕的是,婴儿出生后若不想要,还可以将其杀死,如此等等。那么,建立在这种迷信与野蛮习俗之上的民族信仰体系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三教”——儒教、道教和佛教。毫无疑问,利玛窦是把这三教统统视为邪教的。他甚至认为,正是这三种充满谬误与欺骗的邪教,反过来强化了中国人的迷信与野蛮习俗。所以,他的结论是——其实他一开始就说了——中国人需要基督教的拯救。

利玛窦是明代时到中国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他这样描述明代的中国人,是否有夸大、诬蔑之嫌呢?对此,今天的中国读者不妨先读完下面两章,然后参照中国人今天的习俗与信仰,再作判断。

## 关于某些迷信和其他方面的习俗

在本章中,我们将谈到某些宗派<sup>①</sup>所特有的而又有代表性的某些迷信习俗。

不过,我们首先要请求读者从下面两章中看出,我们有理由同情这些民众并祈求上帝拯救他们,而不是对他们感到厌烦,丧失从不幸中拯救他们的希望。应该记住,他们蒙蔽在异教的黑暗中已长达数千年之久,从来没有或几乎没有看到过一线基督教的光明。不过,我们应该相信,靠着上帝的仁慈和他们自己的内在智慧——他们确有着天赋的聪明——他们最终会认识到自己的不幸处境,虽然直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有任何办法摆脱这一处境。

整个国家最普遍的一种迷信,莫过于认定某几天和某几个小时是好或坏,是好运气或坏运气,哪些时日要做或不做某些事。因为他们做的每一件事,结果如何都取决于时日。这种骗局在他们中间还弄得煞有介事,因而皇家的占星术家每年要编两本皇历,由官方公开发行。这种皇历大量出售,每家都有一本。人们可以在里面查到有关每一个具体的日子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指示,以及每一桩事情都应该在什么确切的时间去做。这样全年都被非常细致具体地给安排好了。除了这种正规的皇历,还有其他许多同类的书,内容更复杂。因而,就有大批骗人的术士以此为生,告知人们哪天 and 哪个时辰要做或不做哪些事。这种欺骗性的告知<sup>②</sup>收费不多,所以人人都会去找这种人。

常常会有这样的事:如果有人要破土动工,他会一天一天地推延日期;要出门的人也会推延行期,为的是一点都不要违背术士对这些事所规定的时日。他们的这种迷信甚至是风雨无阻的。如果在预定的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或是行船逆风,他们也从不迟疑按照事先预定的时日开始行动,因为那个时日大吉大利、万事亨通。说到旅行和动土,只要走了四步路,他们就认为是已经开始旅行了,如果翻了两锹土,他们也就认为是开始破土动工了。为了遵守迷信,在预定要开始这些活动的时日,他们就一定那样做,然后使自己相信事情一定会成功。

这里的民众非常相信用出生的确切时辰来预测他们的终生和幸福,因此每个人都要先向长辈问清楚自己出生的准确时辰,然后牢牢记住。这类预测祸福

① 在利玛窦那个时代,欧洲基督教徒认为只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宗教,其他地区的任何信仰都称不上“宗教”,只能称为“宗派”。——编者注

② 指测字、算命。